



# 法句赞歌

——印度早期佛教经律中的赞颂辨析

湛 如

## 一、引言

早在佛教创立以前，古印度就有利用诗歌来表颂歌颂赞叹的传统。在佛教初创之时，宣传教义最简便的形式，就是易于口耳相传的韵文，后来才逐渐加上散文，成为韵散结合的经典。《高僧传》卷第二中，鸠摩罗什对僧睿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礼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sup>[1]</sup>《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亦载：“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sup>[2]</sup>由上述可知，在印度国俗中，偈颂的内容是以“赞德”为主，并且可入弦歌唱。

同时，偈颂有广狭二义。广义之偈，包括十二部教中之伽陀（梵 gāthā）与祇夜（梵 geyā），两者均为偈颂之体，然两者之意义互异：偈前无散文（长行），而直接以韵文记录之教说，称为孤起偈，即伽陀；偈前有散文，而尚以韵文重复其义者，称为重颂偈，即祇夜。然诸经论中或有混用此二者之情形。狭义之偈则单指梵语之 gāthā，音译伽陀、伽他、偈陀、偈他，意译讽诵、偈颂、造颂、孤起颂、不重颂偈、颂、歌谣，为九部教之一，十二部经之一。“讽颂者，谓诸经中非长行直说，然以句结成，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或五句，或六句。”<sup>[3]</sup>

《法华义疏》卷二又云：“伽陀，为孤起记，亦名不等偈。”（《大正藏》34卷 472b）《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六下曰：“伽陀者，如龙女献珠，喜见说记，孤然特起。”

（《大正藏》33卷 755a）《大乘义章》卷一云：“伽陀，此翻名为不重颂偈，直以偈言显示诸法，故名伽陀。”

（《大正藏》44卷 470a）《百论疏》卷上之上云：“所言偈者，外国称为祇夜，亦名竭夜。”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四云：“十二部经为修多罗、祇夜、授记……何等名为祇夜经？佛告诸比丘……即因本经以偈颂曰：‘我昔与汝等，不见四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苦大海，若能见四谛，则得断生死，生有既已尽，更不受诸有。’是名祇夜经。”（《大正藏》12卷 693b-c）

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云：“祇夜颂此云应颂，为应重颂长行法也。”（《大正藏》36卷 711a）《大乘义章》一曰：“祇夜，此翻名为重颂偈也，以偈重颂修多罗中所说法义，故名祇夜。”（《大正藏》44卷 470a）引文中之“修多罗”，是梵语音译，系指佛经中以散文述说教义的部分，《智度论》卷三十三即云：“诸经中直说者，名修多罗。”（《大正藏》25卷 306c）《显扬圣教论》卷六：“应颂者，谓诸经中，或于中间，或于最后，以颂重显，及诸经不了义说，是为应颂。”（《大正藏》31卷 508c）《瑜伽师地论》亦云：“应颂者，谓长行后宜说伽他，又略标所说不了义经。”（《大正藏》33卷 753a）

综上所述，伽陀与祇夜二者之差别在于：虽然皆是韵文形式，然祇夜者，重复述说长行经文之内容，伽陀则否，故有不重颂偈、孤起颂等之异称。但佛典中或有混用以上二者之情形，并非皆截然划分清楚。以上所述，皆是就广义偈颂而论。而本文所研究之偈颂，乃是以广义之说为对象，亦即包含伽陀和祇夜。

根据《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中所载，偈

颂之作用在于“偈者竭也，摄义竭尽”<sup>[14]</sup>，故偈颂可说是将佛教义理（教义）收摄蕴含于较简洁的文字中表现出来，并且力求竭尽其义。那么，佛陀及其弟子们对于宇宙人生之看法，为何不仅以长行出之，而且要创作出数量颇丰的偈颂呢？《毗婆沙论》谓：“何故以偈颂修多罗？答曰：欲令义理坚固，如以绳贯华，次第坚固；又欲严饰言辞，令人喜乐，如以散华或持贯华，以为庄严。又义入偈中，则要略亦解。或有众生乐直言者，有乐偈说。又先直说法，后以偈颂，则义明了，令信坚固。又义入偈中，则次第相著，亦可赞说。”<sup>[15]</sup>

由上所引，则知偈颂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使经文未尽之处，义理更显明晰，使人生信；且长行之后反复重颂，将会加深人们印象，使其信念更加坚定；再者，由于其言辞大多虔敬、庄严，读颂时，亦使人有喜乐的心灵感受。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因应众生喜好长行或偈颂的不同需求。<sup>[16]</sup>

此文体之语句，则称偈语。梵文文献中由特定音节数与长短组成之韵文，通用于佛教经律论。偈之种类极多，佛典中最常用者为两行十六音节（两句八音节）所组成，称首卢迦（梵 *lōka*），又称通偈。另一种为两行二十二至二十四音节（两句十一至十二音节）所组成，称为 *triśubh*（音律之一种）。此外，不限音节数者为两行八句（四个短音有七句与一音节）所组成，称为 *qṛyā*（音律之一种）。

佛教文献中常常将赞美佛菩萨及祖师等功德伟业之韵文章句称为赞或赞颂，有关之梵语有 *stava*、*stotra*、*stuti* 等，音译成怛罗。其内容除赞叹外，亦或含有譬喻、故事性质者。印度自古即有赞歌，如出于富兰那（梵 *Purāṇa*）文学等有关毗湿奴（梵 *Viṣṇu*）、湿婆（梵 *īva*）等之赞歌，其旨趣与佛教相类似。对佛陀之赞歌最早见于大事（梵 *Mahāvastu*），早期佛教经典中以偈颂赞叹佛德者也很多见。

赞歌成为独立之典籍者，在巴利文经典有长老偈、长老尼偈等。见于汉译之梵文经典，有马鸣所作之佛所行赞、提椎梵赞，及佛三身赞、普贤菩萨行愿赞、七佛赞伽陀、赞扬多罗菩萨一百八名赞等。见于西藏大藏经之礼赞

部者，则有龙树所作之法界赞（梵 *Dharmadhātustava*）、无譬赞（梵 *Nirupamastava*）、超世间赞（梵 *Lokajitastava*），及无著所作之法身位功德赞、萨迦斯利巴得拉所作之如来名歌贤劫庄严鬘等。

另有推断亦为马鸣所作之金刚针论（梵 *Vajrasūcī*），及继马鸣后之赞佛诗人摩诃里制吒（梵 *Mahāśaṅkha*）之作品，如一百五十赞佛颂（梵 *ata-pa-cakṣatkaṣṭhā*）、四百赞（梵 *Caturāṣṭakā*）。七世纪时，戒日王亦有赞佛作品，如龙王之喜（梵 *Nāga-nanda*）、宝行王正论（梵 *Ratnāvalī*）、清容妇人（梵 *Priyadarśikā*）、八大灵塔梵赞（梵 *Aṣṭamahātṛkāṣṭhā*）。十一世纪时，迦湿弥罗诗人克雪曼德拉（梵 *Kṣemendra*）虽为毗湿奴派诗人，然亦倾慕佛教，著有譬喻集（梵 *Avadāna-kalpalatā*）赞叹佛德。

另外，偈颂还是宣传佛教思想及礼佛的重要形式，佛教徒十分重视这种形式的特殊作用，《大智度论》第十三卷指出：

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

由此可见，赞叹歌音是礼佛所必需的。释迦牟尼刚入灭时，卧于狮子床上，迦叶和大众以偈赞佛道：

面如净满月，眼若青莲花；

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

此偈虽为赞佛而作，但同时也赞扬了阿难智慧大，记忆力强。

有些偈颂，则是意义深远的哲理诗。从一些偈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原始佛教教义的真实面貌，比如在几部不同的佛经中，都引述了下列三首偈诗：

第一首为《缘起偈》，又名《法身偈》：

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

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

第二首为《无常偈》，又名《雪山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第三首为《七佛通戒偈》: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这三首偈诗,都配有故事加以解释,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法的原貌,因而受到佛学界的高度重视。

偈颂的种类不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偈,固定由三十二个梵文音节构成;另一种是别偈,共四句,每一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不定。“偈颂”连称,其实是梵汉双音并举,已为人们所接受。

佛经中的偈颂,无论其内容如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扬佛法。比如大乘瑜伽行派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其实都是按诗体分行的佛学著述。许多佛经中的偈颂,都很富有哲理性。

## 二、《法句经》中的赞颂

《法句经》,梵 Dharmapada,巴 Dhamma-pada,是集录诸经中佛之自说偈而成的经典,亦为策励学众精进向道,富有感化激发力量的偈颂集。行文概多平易简洁,间杂巧妙的譬喻,内容更教示以佛教真理观、社会观的根本义理,是佛道入门的指南。在说一切有部、法藏部中,《法句》又称《优陀那》(Udāna)。现存的《法句经》,有汉译本四部、铜鐻部(Tqm-ra-1qtjyqh)传巴利语本一部、藏译本二部,以及近代发现的梵文本、犍陀罗语本。概因部派而有不同诵本,由于其组织不同,偈颂数亦异。现存《法句经》的不同诵本,完整无缺者,有二十六品本、三十九品本、三十三品本。

(1)二十六品本:从双要品至婆罗门品,共四二三偈,为铜鐻部所传巴利语本,编为南传巴利圣典《小部》第二《法句经》。有觉音著《法句注》(Dhammapadamkatha),注本中附有二九九种譬喻。

(2)三十九品本:从无常品到吉祥品,共分二卷,名为《法句经》,吴天竺沙门维祇难等所译,收在《大正藏》第四册。依《三藏记集》卷七《法句经序》所

载,维祇难所传者原是五百偈本,后从同道竺将炎,补出十三品,成为七五二偈。若比对《小部》的《法句经》与此三十九品本,可知二十六品的次第相合,唯插入十三品,可见三十九品本是在二十六品的基础上扩编而成。在内容方面,《法句经》本为出家众所常诵,而三十九品中,有几品重于在家,如道利品、说君王(轮王)治国安民的法门。

(3)三十三品本:从无常品到梵志品,为说一切有部所传。据说是法救(Dharmatrāṭa)所撰集。法救为西元前一、二世纪间人,是扩编《法句经》者,而非创编者,亦即为说一切有部诵本的编集者。此说一切有部本系以梵语写成,现有梵本存在。西藏译本亦属三十三品本,名《优陀那品》(Ched-du-brjod-pa4i tshoms),为偈颂本;另有名为《Ched-du-brjod-pa4i tshoms-kyirnam-par-4grel-pa》者是《法句》的义释,并附有长行的譬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阿富汗相继出土了三批犍陀罗语梵语文献,即大英图书馆的收藏品、Schyen Collection<sup>[7]</sup>和 Senior Collection<sup>[8]</sup>,再加上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藏品中的8件残片<sup>[9]</sup>。《犍陀罗语法句经新译本及本生故事集》是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邵瑞祺(Richard Salomon)教授所主编的“犍陀罗佛教文献”(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系列丛书的第三部,此为《法句经》的最新传译本,被称为“伦敦本”。这一版本与于阗本内容相似,却又有明显的差异,是犍陀罗语文本的再发现。作者认为,所有的《法句经》及其《法句经》类型的文献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只不过,由于时代、地域以及部派的不同而出现了文本的差别,伦敦本与于阗本就是同一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经典所派生的两种传本。作者推测其源流为:共同的传统——中世印度雅利安原型(Middle Indo-Aryan Archetype)——伦敦本、于阗本(并列)。后二者之间差异的形成,很可能不是由于犍陀罗地区不同的佛教部派,而是其它方面未知的原因。除在佛教史上的意义外,伦敦本的重大价值亦体现于可以用来比较同一部犍陀罗语



文献的两个版本的语言。邵瑞祺 (Richard Salomon) 教授所主编的“犍陀罗佛教文献”(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 的相关资讯已有萨尔吉与陈明向国内学界进行了介绍。<sup>[10]</sup>

1892年,F.Grenard 在于阗附近就发现了用佉卢文写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古写本,系以佉卢虱吒文字书写于桦树皮上,一般称之为于阗本,该写本后来相继由 éSenart、H.L üders、Otto R.Franke、Jule Bloch、Sten Konow、H.W.Bailey 和 John Brough 所研究,John Brough 并出版了堪称一代名著的《犍陀罗语 法句经》(Gāndhārī Dharmapada)<sup>[11]</sup> 研究之后,判定其书写年代可能在西元第二世纪以前,堪称现存最古之佛典古写本。后于库车、敦煌等地亦陆续有梵本断简之发现。此等梵本断简,经洽库拉瓦替(N.P. Chakravarti)集成,题为 L' Udqnavarga Sanskrit,一九三一年刊行前二十一品。西藏译与法集要颂经相同,均有三十三品,与巴利文相较,颇多异同,其偈颂相同者仅得二百数十偈。

实际上,《法句经》在不同部派中均有独自的传承,汉译《法句经》出现时,共有三十九品七百五十二偈,其主体为二十六品,传译自巴利语语系的五百偈系统。在不同系统的《法句经》中,帕特纳与于阗本的版本最为珍贵。1935年,印度佛教僧人在西藏寻访佛教圣迹时,意外发现各种梵文佛经的抄写本,随后将该批文献带回帕特纳,其中包括这种语言的《法句经》原本。

此外,西晋法炬、法立共译《法句譬喻经》四卷(属巴利语系,收于《大正藏》第四册),又称作《法喻经》、《法句喻经》、《法句本末经》,亦分三十九品。每品之譬喻故事必列举本经中之若干法句偈颂,以解说其因缘,总计有六十八种譬喻。又佛音(巴 Buddha-ghosa)所作巴利文法句经注(Dhammapadamakathā),解释巴利文《法句经》四二二颂之字义,并说其因缘,总计有二九九种譬喻。收于西藏丹珠尔(藏 Bstan-4gyur)阿毗达磨部(藏 Mn5on- pa)中之 优陀那品 注解(藏 Ched-du- brjod- pa4i tshoms- kyirnam- par4grel- pa)及汉译《出

曜经》三十卷(属梵语系,收于《大正藏》第四册),皆为解说 优陀那品 之因缘者。

《法句经》由于其内容多为长短有序的诗偈构成,使得该经在不同的部派传承中深受人们的喜爱。多数偈颂叙述平实,说理简洁明了,吟诵起来朗朗上口。在汉译过程中,本经一般采用中国固有的四言、五言或七言诗,格律疏于严整,渐渐形成中国佛教文学中的偈颂诗形式。由于语言接近口语,句子组织自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诗风的通俗化<sup>[12]</sup>。同时,在四百多句的法句中,也有以赞颂形式出现的内容。此类内容有时赞颂佛陀,有时则由佛陀赞叹声闻尊者。我们认为广义的佛教赞颂文学不仅仅是《佛所行赞》、《四百赞》等,还应包括早期佛教文献中与赞颂相关的内容,《法句经》中的赞颂诗偈便包含了这一类内容。

南传《法句经》第十四品为 佛陀品,此品专门颂扬佛陀及佛陀的开示,如第一偈描述佛陀不被欲望诱惑,大意是:佛陀居住在祇树给孤独园时,在一次对来自拘留(Kur[ s]国的婆罗门摩醯提亚(mogandīya)夫妇的开示中,重复了自己曾对魔王(māra)波旬和他三个女儿的教导。摩醯提亚(mogandīya)的女儿容貌美丽,求婚者不断。当摩醯提亚遇到佛陀时,就认定只有佛陀如此庄严的人才才有资格与自己的女儿在一起,而佛陀拒绝了摩醯提亚夫妇的好意,并告诉他们:“已经解脱贪爱执著与激情的人是不受诱惑的。以前魔王的三个女儿,曾以不同方式向佛陀发出诱惑,而他自己却能止心如水,不为所动。”听完佛陀一席话,摩醯提亚(mogandīya)对佛法有了正确的信念,后来都加入僧团,出家修道。

由此可见,贪欲与情爱对圣者是不能发生作用的,圣者不可能在这些贪欲上留下痕迹。佛陀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弃除一切贪爱垢秽,已经证知世间万事万物无常、苦、空、无我的实相,并已体证苦集灭道四圣谛。

巴利语偈颂是:

14- 1

Yassa jitam navajiyati 佛已胜诸垢  
jitam yassa no yati koci loke 在世永不败  
Tam buddhamanantagocaram 无迹心无尽  
apadam kena padena nessatha 如何诱惑他

14- 2

Yassa jalini visattika 佛不受诸缚  
tanha natthi kuhibci netave 弃爱欲三毒  
Tam buddhamanantagocaram 无迹心无尽  
apadam kena padena nessatha 如何诱惑他

南传《法句经》第十四品为 佛陀品 5- 7 偈颂专门

回答由尊者阿难提出的问题，巴利语简短的语句概括了佛教的主旨与要义：

Sabbapapassa akaranam 诸恶莫作  
kusalassa upasampada 众善奉行  
Sacittapariyodapanam 自净其意  
etam buddhana sasanam 是诸佛教  
Khanti paramam tapo titikkha 佛说涅槃最  
nibbanam paramam vadanti buddha 忍辱最苦行  
Na hi pabbajito parupaghati 害他非僧人  
na samano hoti param vihethayanto 烦他非沙门  
Anupavado anupaghatto 不挑不扰人  
patimokkhe ca samvaro 严谨守戒律  
Matlabbuta ca bhattachasim 饮食知节制  
pantabca sayanasanam 喜悦静独处  
Adhicitte ca ayogo 精进炼净心  
etam buddhana sasanam 是诸佛教诲

一时，阿难请佛陀开示：“世尊！诸佛的佛法是否与您的教法一致？”佛陀回答说：“所有诸佛的佛法都是一样的。”佛陀说了以上过去诸佛开示的一些偈语。这些语句简洁明了，便于传诵和记忆。

南传《法句经》第十五品为 乐品，通过简要朴素的语言开示法要，劝诫人们少欲知足、享受法乐。

佛陀一次遇到一位穷人在寻找走失的牛，而村庄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供养佛陀及诸位比丘，并期待佛陀能为大家说法。但佛陀却要等丢牛的人回来，其人

归来后，立刻跑来问候佛陀，佛陀让他先进饮食、稍加休息后再为大家说法，最后此人闻法后，证得初果。诸比丘不解佛陀为何要等到丢牛者饭后才为大家讲解法要，佛陀讲述了以下偈颂：

15- 7

Jighacchaparama roga 饥为难受病  
savkharaparama dukha 业为最大苦  
Etam batva yathabhutam 如实如实道  
nibbanam paramam sukham 涅槃最上乐

南传《法句经》第二十五品为 比丘品，从比丘日常的身心收摄、如法如律的生活，到比丘清静而诸天赞叹等内容均有描述。其中：

25- 1

Cakkhuna samvaro sadhu 防守眼为善  
sadhu soteṇa samvaro 防守耳为善  
Ghanena samvaro sadhu 防守鼻为善  
sadhu jivhaya samvaro 防守舌为善

25- 2

Kayena samvaro sadhu 防守身为善  
sadhu vacaya samvaro 防守口为善  
Manasa samvaro sadhu 防守意为善  
sadhu sabbattha samvaro 防一切为善  
Sabbattha samvuto bhikkhu 僧人防一切  
sabbadukkha pamuccati 解脱诸苦难

舍卫城有五位比丘各自修习调伏五根的相关法门，每位比丘都认为自己修习的根门最难防守，最难调伏。佛陀开示他们：“眼、耳、鼻、舌、身五根门同样难以收摄，若有比丘能全部收摄、调伏这些感官，就能从苦恼中解脱。”

25- 4

Yo mukhasamyato bhikkhu 比丘调御口  
mantabhani anuddhato 抑语不自大  
Attham dhammabca dipeti 显说法要时  
madhuram tassa bhasitam 语言柔甘美

这首偈颂是佛陀对瞿迦利迦比丘的开示。瞿迦利

迦比丘口不择言，辱骂舍利弗和目犍连两位尊者，佛陀知道后告诫他：“比丘要抑制口欲，不可逞口舌之快，比丘必须收摄口业，调御语言，不可自大，内心必须祥和镇静，才能解脱心中恶念。”

25-6、25-7 两首偈颂则是佛陀教诲比丘少欲知足、精进修学，诸天赞叹的描述：

Salabham natimabbeyya	不轻自所得
nabbesam pihayam care	不羡他人得
Abbesam pihayam bhikkhu	比丘羡他得
samadhim nadhigacchati.	无法证寂静
Appalabhopi ce bhikkhu	比丘所得少
salabham natimabbati	不轻嫌所得
Tam ve deva pasamsanti	清静不懈怠
suddhajivim atanditam	诸天所赞叹

早期佛教文献中记载，提婆达多曾不止一次想要加害佛陀，而佛陀的一位弟子却经常与提婆达多的弟子交往，而且交往密切，常在提婆达多弟子的精舍停留，享受种种招待。佛陀知道后告诉这位比丘：“虽然你不接受提婆达多比丘的邪说，但你的行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比丘应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不可垂涎他人的物质财富。妄羡他人的比丘，内心无法平静，无法修习禅定。比丘应守戒律，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调伏自己的身心，观无常、无我的实相。”

《法句经》语言朴素流畅，语法规则，较少有不规则的语法形式。使用的韵律古老而又通俗，便于念诵吟唱和记忆传授。同时，在讲述的偈颂中大量使用譬喻、排比等修辞方式，浅显易懂，通俗而不晦涩。这也是佛教早期文学形态必须做出的选择，这与佛教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中下阶层有着密切联系。<sup>[13]</sup>

#### 【注 释】

- [1] 慧皎《高僧传》，53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2] 僧祐《出三藏记集》，534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3] 显扬圣教论》卷六，《大正藏》31 卷，509a。  
[4]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中，《大正藏》33 卷，

471b。

[5] 《毗婆沙论》卷一，《大正藏》32 卷，244c。

[6] 《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六上云：“经以名味章句为体，经无不然，故体一也。相二者：长行直说，有作偈赞颂两种相别。何者？以人情喜乐不同，有好质言，有好美语故。”（《大正藏》33 卷，752a）。

[7] Mark Allon and Richard Salomon, “Kharoṭh Fragments of a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in: Jens Braarvig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 pp.243-273. Richard Salomon, “A Jar with a Kharoṭh Inscription”, in: Jens Braarvig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II: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ume I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2. pp.351-355.

[8] Senior Collection 是由英国 Butleigh 的 Robert Senior 所获，共有 24 件写在白桦皮上的犍陀罗语文书。Cf. Richard Salomon, “The Senior Manuscripts: Another Collection of Gandhārī Buddhist Scrol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3.1, 2003. pp.73-92.

[9] Richard Salomon, “Kharoṭh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ulletin d’Etudes Indiennes 16, 1998. pp.123-160.

[10] 分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7 卷，中华书局，2003 年，451-456 页；《中国学术》总第 15 辑，2003 年第 3 期，315-320 页。

[11] John Brough,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 《梵典与华章》，188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3] 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13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